

《全球通史》中国史书写勘误及教育意义

杨长红^{1*}

(¹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作为全球史的奠基之作,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全球通史》在中国古代史书写方面存在诸多史实错误, 主要涉及商周史、孔子思想、秦汉史、中国史学等方面。这提醒我们在阅读国外汉学研究著作时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史实认知, 尤应加强对青少年阅读此类著作进行引导, 纠正书中存在的史实错误, 树立和培养青少年正确的历史价值观。

关键词: 《全球通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 书写勘误; 青少年教育

DOI: <https://doi.org/10.71411/jyyjx.2026.v1i1.1091>

Corrections a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History Writing in *The Global History*

Yang Changhong^{1*}

(¹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a foundational work in global history, *The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by the American historian Stavrianos holds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import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ssential to recognize that *The Global History* contains numerous factual errors in its depi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rimarily concerning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Confucian thought, the history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reminds us to maintain a clear awareness of historical facts when reading works on Sinology by foreign scholars. In particular, great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guide young readers in their engagement with such works, correcting factual inaccuracies in the book and foster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cultivation of correct historical values among the youth.

Keywords: *The Global History*; Stavrianos; Writing errors; Adolescent education

引言

《全球通史》自 20 世纪 70 年代问世以来, 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该书摒弃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书写模式, 以全球视角对世界历史做出整体性观察, 在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然而, 该书中国史部分存在多处史实书写错误。该书作为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目之一, 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勘误, 这有益于我国青少年学习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兹将英文本第七版中存在的基本史实错误列出, 以资参考。

作者简介: 杨长红 (1999-), 男, 贵州从江,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史

通讯作者: 杨长红, 通讯邮箱: 1753385265@qq.com

1 《全球通史》中关于商周史的书写错误

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第三节“古代文明的类型”和第五节“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将商周两朝的建立描述成外来民族对中国文明的入侵：商人征服中国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部落而建立商朝，但却被中国人所同化^{[1]61}；周人入侵中国北方建立周朝，也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的发展^{[1]69}。此观点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巨大误解，将商周两朝的建立描述成外来民族对中国的入侵是极为不妥的。

据《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载，商族始祖契生活的年代与尧舜禹同时，且担任舜和禹的官员，因功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周族始祖后稷也是与尧舜禹同时，且担任尧舜禹的官员，因功受封于邰（今陕西武功）。可知商周两族均在夏朝建立前就已经属于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是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者和重要组成部分。斯塔夫里阿诺斯上述观点存在否认商周文化作为早期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嫌疑。

斯塔夫里阿诺斯探讨商代中国的两性地位问题时，指出商代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杀害女婴现象普遍，女子在童年时便被迫缠足，婚姻也由父母包办^{[1]62}，此种观点缺乏历史依据。首先，关于杀害女婴问题。一般认为，杀女婴或者杀婴现象主要存在于明清时期，但这一现象并不普遍，据英国学者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中国旅行记》载：“我们在这个国家走过了1600多英里，经过了人口密集的江河流域，从未见过被溺死的婴儿，沿陆路的旅行，尽管他路过城镇或乡村是在清晨，其他时间都是在路上，也从未看到过被遗弃在外面或者已经死亡的婴儿^[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商代即使存在杀婴现象也绝非普遍。其次，关于缠足问题。目前所见最早记载缠足的文献是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妇人之缠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3]。据此可以判断，缠足起源即使先于宋代，也不会过于久远，不能认为商周时期的女子普遍缠足。最后，关于包办婚姻问题。该现象不知起源何时，作为包办婚姻代表的西周六礼也仅流行于统治阶级内部，民间恋爱和婚姻的自由程度较高，《诗经》中自由恋爱的例子比比皆是。综上，斯塔夫里阿诺斯关于商代杀女婴现象、缠足现象及包办婚姻现象的描述存在可商榷之处。

2 《全球通史》中关于孔子事迹和思想的书写错误

第七章《中国文明》第二节“哲学家和经典”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于孔子的叙述存在多处错误，如他将孔子的形象定义为由失落政客向教育家转变^{[1]130}。实际上，孔子早年时即已在家乡收徒讲学，其17岁时“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孔子成年后“弟子稍益进焉”^{[4]1908-1909}。《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载颜路在“孔子始教于阙里而受学焉”等^{[4]2210}，可以说孔子一生都在扮演着教育家的角色，而非是从政治家转向教育家。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孔子获得过几个较小的职位，对当时的实际政治并未产生较大影响，此乃一误。孔子一生仕国多处，最有作为当是在鲁定公时期。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八年，孔子任中都宰；九年，孔子任司空，升大司寇；十年，孔子摄相事^{[4]1909-1917}。可知，孔子早年时即已担任司空之职，位列三公。鲁定公时期，孔子担任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甚至摄行相事，仕途达到鼎盛时期。此时期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地位不可谓不高，职权不可谓不大。孔子执政期间，鲁国的内政外交大有起色。内政方面，孔子任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4]1915}。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摄相事，“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4]1917}；外交方面，齐国对于孔子主政鲁国颇为忌惮。孔子任大司寇时，齐大夫黎言于齐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4]1915}，齐景公遂约鲁定公会于夹谷，齐人欲以兵劫定公，为孔子所斥，齐人欲以俗礼辱定公，又为孔子所斥。齐景公回国后大恐，对群臣说：“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于是归还“所侵之鲁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4]1915-1916}。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摄相事，齐人闻而懼，曰：

“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4]1918}。可见，孔子是一位极具政治手腕的政治家，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只是这种影响力短暂，不久因三桓乱政被迫离鲁，终不能用。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保守的，他企图保持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1]130}。这个评价基于孔子所处年代而言是相当不恰当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恢复传统的周礼，游说各国君主遵守周礼的规定，对僭越周礼的行为嗤之以鼻，如《论语·八佾》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4]30}？”但这并非说孔子的学说就是保守的、复古的，孔子不是要完全恢复古制，而是主张对旧制度加以改造，力图适应社会的发展，他希望人们通过对周礼的遵行以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3 《全球通史》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书写错误

第七章《中国文明》第四节“汉朝”中，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于司马迁及《史记》的评价是相当片面的，他认为《史记》只是一部资料汇编，而非一部独创性作品，司马迁也只对同时代的时间和人物作出评价，缺乏希罗多德著作中的戏剧性因素^{[1]137-138}。表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古代中国史学缺乏系统认知。首先，《史记》并非仅仅是一部资料汇编作品，司马迁对于史料的解读能力及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史记》取得重要成就的原因之一。史记中刻画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不亚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其次，司马迁并非只对于他所处时代的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不论是本纪、年表、书、世家、列传，均有司马迁对此前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独到之见。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认知也是非常笼统的，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史学家都相信天命的观念^{[1]138}。天命观在中国古代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乃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但并非古代中国的学者都受该思想的影响，仅史学领域而言，就有许多不相信天命观的优秀史学家，如范晔疾呼“天下决无鬼佛”^[5]，范缜对南北朝时期盛行之有神论嗤之以鼻，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也”^[6]，柳宗元著《非国语》明确地否定天命的存在，认为山崩川竭等自然现象并不与家国人事相关^[7]。此外，桓谭、王符、郑樵、马端临著名史学家等均显露出对天命观念的批判锋芒。综上可知，朴素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并非所有的中国史学家都相信天命观念。

与对司马迁的评价一致，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史学家只是致力于资料汇编而缺乏自主思考^{[1]138}。此观点是斯氏片面关注中国史学重视史料传统造成的失误。中国古代史学除了拥有注重史料收集这一优良传统外，对于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如范晔的《后汉书》便是以史论结合之佳著称，作者对于东汉时期的政治得失、人物品行、宗教学术等方面均有提出独到见解。如他批判南北朝时期的方术“纯盗虚名，无益于用”^{[4]2725}，批判汉武帝“颇好方术”，王莽“矫用符命”，光武帝“尤信讖言”，导致“士之赴趣时宜者，皆弛聘穿凿，争谈之也”等^{[4]2703}。此外，《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皆是史论结合之佳作，后世史学著作对历史问题提出独到见解的亦不乏多见。我国古代对历史问题作独到见解这一优良史学传统保持至今，这也是促进我国史学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4 《全球通史》中其他史实的书写错误

第七章《中国文明》第三节“秦朝”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秦国实现统一的军事原因在于最早以铁制武器替代青铜武器，以骑兵取代战车兵^{[1]132}。这里有两处明显的史实错误：其一，秦国并非是最早以铁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的国家。战国时期的冶铁中心主要分布在吴楚、三晋等地区，楚、韩等国尤以铸造铁制兵器闻名。秦国也有冶铁中心，但质量较关东诸国差。据周纬《中国兵器史稿》载：“秦处西北，古时产铁甚少，远不如华中华南铁产之富，故秦王曾与铁兵不利之叹^[8]。”其二，秦国并非是最早以骑兵取代战车兵的国家。众所周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

标志着骑兵开始成为独立兵种,并逐渐取代战车兵成为战争的主要兵种。虽然《韩非子》有秦穆公以骑兵护送重耳回国为君的记载^[9],但此时骑兵尚未发展成为独立兵种,更谈不上在战争中占据主要地位。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秦国统一六国的经济原因在于公元前318年占领了四川平原^{[1]132}。此处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对应错误。据《史记·秦本纪》载:“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4]207},《史记·六国年表》载:“九年,击蜀灭之”^{[4]732},此处的“九年”是指秦惠文王更元九年。按顾颉刚、贺次君等注,更元九年为前316年^{[4]732}。前318年是更元七年,当时“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4]207},不胜而还。关于司马错伐蜀的时间,学界常因忽视秦惠文王十四年更元的问题,而将更元九年误记为秦惠文王九年,从而在公元纪年的转换上出现错误。

第七章《中国文明》第四节“汉朝”和第八章《古典文明的终结》第二节“蛮族的入侵”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农民起义、军阀政变和游牧民族袭击等因素导致汉朝在222年灭亡,并指出灭亡汉朝的游牧民族是突厥和蒙古^{[1]145}。上述存在三处明显的史实错误:一是汉朝灭亡的时间。建安二十五年即220年,献帝被迫禅位于曹丕,曹魏的建立标志着东汉的灭亡,而不是222年;二是东汉灭亡的原因。东汉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内部军阀割据势力的崛起,其时东汉政府并没有面临严重的北疆危机,这主要归功于曹操在统一北方后对鲜卑、乌桓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军事优势;三是突厥与蒙古灭亡汉朝。两汉时期面临的北方压力主要来自匈奴,突厥和蒙古最早出现于北魏时期,与汉朝毫无关联。

第十三章《传统的儒家文明》第三节“元朝蒙古人的统治”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忽必烈将元朝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1]218}。事实上,忽必烈时期从未定都于和林。蒙哥汗死后,蒙古帝国出现了一国两君的局面,忽必烈定都开平府,阿里不哥定都和林。忽必烈取得内战胜利后,以“开平府阙廷所在,加号上都”,将燕京“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形成两都制格局。至元九年(1272),大兴府更名大都。关于和林的建制沿革,据《元史·地理志》载,中统元年(1260)置和林宣慰司,至元二十七年(1290)置和林等处元帅府,大德十一年(1307)置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皇庆元年(1312)置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终元不变^[10]。可见,有元一代和林一直作为地区性中心存在。

5 结语

上述《全球通史》中国史书写的错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文化差异。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必然存在理解误差;二是史识缺乏。受史料局限影响,作为外国学者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历史的细节缺乏全面了解。鉴于《全球通史》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诸多学校以该书作为学生了解历史的入门书籍,已然成为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目。在这种情况下,《全球通史》必然对我国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青少年阅读《全球通史》进行引导,纠正书中关于中国史叙述的史实错误,时刻保持清醒的史实认知,这对于加强我国青少年学习正确的历史知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L.S. 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M]. 7th edition. New York: Pearson, 1998: 61-62+69+130+132+137-138
- [2] (英)克拉克·阿裨尔. 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M]. 刘海岩,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2017:220-221.
- [3] (北宋)张邦基. 墨庄漫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75.
- [4] (西汉)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0+145+207+218+732+1908-1918+2210+2703+2725.
- [5] (南朝)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29.

- [6] (唐)姚思廉. 梁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665.
- [7] 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纲[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368.
- [8] 周纬. 中国兵器史稿[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143.
- [9] 高华平, 王齐洲, 张三夕译注. 韩非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03.
- [10] (明)宋濂.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347.